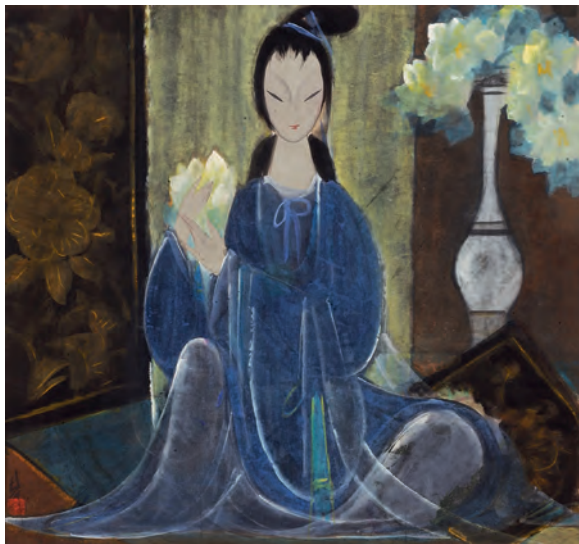


带，让岭南革新精神与海派包容气质彼此滋养，成为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中地域文化共生共荣的生动范本。

1912年，彼时的上海正处于社会转型之际，东西思潮激荡，为艺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开阔舞台。这一年4月，在上海福州路的惠福里，来自广州的“二高一陈”——高剑父、高奇峰、陈树人，创立了审美书馆，他们以《真相画报》为旗帜，在第一期刊出陈树人编译的《新画法》中发出中国画的革新先声。这座隐匿于弄堂的小楼，就此成为艺术变革的策源地，也成为了岭南画派最初的摇篮。

而“岭南画派”这一历史性命名，也同时受到海派巨擘刘海粟的重要影响，1934年，他在德国柏林举办的“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”前言中，首次明确将“二高一陈”的艺术探索从“折衷派”定义为“岭南画派”，从此基本奠定了“折衷派”即是“岭南画派”的冠名。此外，一众名士鸿儒云集沪上，形成强大的艺术磁场，本土艺术与外来视觉语言交融，这座移民城市以其特有的包容，为这群南来的艺术青年提供了发声的舞台。回顾历史，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陈翔感慨万千：“19世纪末的上海已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艺术生产场。上海这一现代性场域具有鲜明的



上图：林风眠《青衣仕女（20世纪60年中国画）》，上海美术馆藏。

混杂性、开放性和流动性，堪称‘新艺术的孵化基地’。”

《真相画报》将岭南画派的革新思想与上海的国际化视野深度结合，不仅刊发黄宾虹等海派名家作品，更首次系统引介世界美术潮流，成为连接南北艺术的桥梁。潘和、黄般若等人于

右图：方人定《闲日（1931年中国画）》，广东美术馆藏。



1926年成立的“广东国画研究会”则坚守传统，力倡“研究国画，振兴美术”。两派因艺术主张的不同而论争数十年，看似“新与旧”的交锋，实则中国美术面对现代转型的深层探索——岭南画派的革新精神与国画研究会的守正理念，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生动注脚。

1932年，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在上海创作了其“新国画”代表作《东战场的烈焰》，用一场绘画领域的“革命”打破了传统中国画的题材边界，以中西融合的技法、直面现实的视角，将时代思考凝于尺幅，抒发革命激情。“新国画”的概念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画和西洋写实绘画的结合，另一方面提出了“中国画如何表现现实”这个中国画现代性的核心命题。它不仅体现在岭南这一个画派上，它体现的是20世纪中国美术，尤其是传统美术迈入现代社会所形成的转型思考与实现路径。

粤沪两地艺术发展始终保持密切的双向互动，留下诸多深刻的历史印记。1919年，林风眠从广东省立梅州中学毕业后，短暂入读上海图画美术学校（即后来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），在沪开启艺术求学之路，为其日后“调和中西艺术，创造时代艺术”理念埋下伏笔。本次展出的“彩墨画”《青衣仕女》，便是他艺术